

陶渊明文学“桃花源”的建构与失落

王淑梅^{1*}, 王锦萧¹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作为陶渊明笔下的乌托邦世界,“桃花源”的文学生成与建构路径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研究发现,陶渊明以田园诗积淀的自然审美、农耕体验为诗意基底,转译《老子》“小邦寡民”的政治哲学为文学理想,借刘晨阮肇采药故事叙事模本,经三重维度完成“桃花源”文学建构。尤为关键的是,文本以“似真还幻”叙事营造张力,以“问津”行动的延展与最终落空暗喻理想世界探寻的失落轨迹。直到隋末唐初以前,“无问津者”的沉寂状态始终未被打破。

关键词: 陶渊明; 桃花源; 文学建构; 失落

The Construction and Loss of Tao Yuanming's Literary “Peach Blossom Spring”

Wang Shumei^{1*}, Wang Jinxiao¹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As a utopian world depicted by Tao Yuanming, the literary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Peach Blossom Spring” is a topic worthy of explor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existing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ao Yuanming takes the natural aesthetics and farming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his pastoral poems as the poetic foundation, translate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 small state with few people” in Laozi into a literary ideal, and borrows the narrative model of the story of Liu Chen and Ruan Zhao collecting herb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Peach Blossom Spring” is completed. What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is that the text creates tension with the “seeming real yet illusory” narrative, and uses the extension and ultimate failure of the “seeking the ferry” action to metaphorically imply the lost trajectory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deal world. Until before the end of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silent state of “no one seeking the ferry” had never been broken.

Keywords: Tao Yuanming; Peach Blossom Spring; Literary Construction; Loss

引言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小说的笔法,虚构出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桃花源境界,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1]虽为虚构,但有其现实来源基础。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认为“陶公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麟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2]又曰“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2-202]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又提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3]邓和平《哪处桃源可避秦》认为,真正的桃花源在武陵山。^[4]以上所论聚焦《桃花源记》的虚构本质与现实根基,然从文学本体生成视角探究其建构路径的研究尚显不足。钟书林《<桃花源记>文本生成问题再探》一文探究了箕子、田畴原型与陶渊明的

新自然观及政治寄托与文本生成的关系^[5]，受其启发，笔者拟从诗意基底、思想溯源、叙事结构及解构失落等方面，探讨陶渊明“桃花源”的文学建构与失落。

1. 田园诗境：《桃花源记》文学建构的诗意基底

桃花源无疑是战乱流离中的避难所，作者陶渊明在现实中没有归隐幽僻的山林，而是回归田园，他是文学史上大量写作田园诗的第一人，其笔下的田园与桃花源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笔者统计，陶渊明创作田园诗 32 首（含组诗单篇），最早描写田园闲适生活的是《和郭主簿》二首，约作于 403 年。田园诗的创作高峰是在其归隐之后，如《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 并诗》等主要创作于 406 年至 427 年之间。《桃花源记 并诗》的作年，学界目前倾向于刘宋永初二年（421 年），此时陶渊明亲历了无数的战乱，既有太元十年（385）西燕攻入长安，纵兵暴掠，民生凋弊，百姓无以为生，甚而“人相食”的现实。又有义熙六年（410）孙恩起义军卢循军在陶渊明家乡寻阳与东晋官军频繁交战，老百姓无奈逃亡之事。《晋书·刘毅传》载，义熙八年（412）刘毅上表“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6]这种情形乃乱世所常有，特别是陶渊明的《拟古》其二：“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1-275]，田畴，字子泰，《三国魏志·田畴传》记载：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7]。徐无山是田畴为乱世中的父母百姓经营的避难所，数年间竟然有五千余家聚集于此，陶渊明无疑知道田畴的事迹，徐无山就是乱世中的桃花源。不过乱世中的这些事迹只是提供了一个原型，要把这样的原型描绘成“桃花源”，还需要具体的文学建构过程。

《桃花源记》写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402]《桃花源诗》又曰：“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馥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1-403]以之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相参阅，其归隐前创作的《和郭主簿》诗中：“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1-128]同为怡然自乐的风调，而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则曰：“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1-181]写农耕生活的欢欣。归隐后所作《归园田居》组诗，其一曰：“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1-73]其二曰：“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1-77]其五则曰：“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1-83]可视为在诗歌维度对《桃花源记》隐逸主题、田园理想的诗意呼应。作于 412 年的《移居二首》则有“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1-114]“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1-117]于宋武帝永初三年所作《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1-334-335]诗人不厌其烦地细致描画出朴野宁静的村庄田舍，尽情铺写躬耕、读书、饮酒之乐以及亲友往还、共话桑麻的人际关系，田园生活的惬意悠然与桃花源无异，田园就是现实中的桃花源。其《自祭文》亦曰：“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致百年。”^[1-462]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疏放，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的恬适，乐天委分、以致百年的自足，恍然如见天际真人。

2. 老氏遗韵：“小邦寡民” 政治理想对《桃花源记》的思想奠基

《桃花源记》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在于他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老子》笔下的“小邦寡民”的翻版。《老子》第八十章：

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

此处“小邦寡民”取帛书甲本，帛书乙本与王弼本皆作“小国寡民”。《老子》描绘的“小邦寡民”的世界，特点有四：第一，回归往古太初，戒掉贪婪与奢靡，“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第二，生活美满，“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第三，淳朴自足。第四，空间独立，“不相往来”。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与《老子》颇有相似之处：第一，类似于小邦寡民，桃花源的来历是：“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第二，衣食无忧。“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设酒杀鸡，皆出酒食。”第三，安居乐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往来种作，怡然自乐。”第四，相对独立，与外界不相往来，“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402]”。

《桃花源记》呈现的理想社会，可与《老子》“小邦寡民”的思想意涵形成对话。从文学建构维度来看，二者存在显著差异：《老子》对理想世界的勾勒具有哲学抽象性，《桃花源记》则通过时间、空间、人物三个不同维度的文学叙事，将理想图景具象化、真实化。在时间维度，桃花源肇始于秦末乱世，历经汉、魏的时间延续，直至东晋太元中为渔人所发现，“太元”作为东晋孝武帝年号，赋予叙事明确的历史节点。空间维度上，开篇提及“武陵”，作为西汉初即确立的郡县，隶属荆州，且在《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正史与地理典籍中多有载录，可知其大致位于今湖南省常德市境内，强化了叙事的真实感。人物层面，以“渔人”这一具体个体为叙事线索，使理想世界的呈现具备微观视角的真实载体。文中提到的刘子骥，是陶渊明同时代人，《晋书》云其“好游山泽”，《世说新语》中记载其求登张玄船烹食的故事：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歧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9]。

刘子骥率性而为，任真自然，呼应《桃花源记》“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的人格特质，佐证桃花源文学建构中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与典型性。从抽象理念到具象文学叙事，体现出陶渊明对理想社会思想的文学性重构。

3. 传说渊源：刘晨、阮肇采药叙事对《桃花源记》的结构塑形

《桃花源记》结尾，提到刘子骥“欣然规往”，《南岳总胜集》中记有他入衡山采药的故事：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开，一困闭，水深湍，不能过。欲还，失路。值樵者，问津，仅得家。…麟之再寻索，已失所在^[10]。

刘子骥入衡山采药失路，得樵夫帮助得以还家，后来再去寻索，已失所在，结尾与《桃花源记》的故事结构相似。颜延之《陶征士诔》称陶渊明是“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11]，此处“南岳”沿用江东旧称，实际是指姑孰横山（古衡山），陶诗《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1-28]中“衡门”或指横山石门。其《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219-220]，横山古名“藩篱”，陶渊明的确隐居于此。道士仙翁多入衡山采仙药以养生，义熙七年陶渊明所作《祭从弟敬远文》：“绝粒委务，考槃山阴。淙淙悬溜，暖暖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年甫过立，奄与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1-456]提到敬远采药、辟谷等，且“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与敬远泛舟秋游，饮酒至乐。不过，刘子骥采药故事情节过于简单，并未描写一个神秘“异境”。而汉代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的故事却与《桃花源记》的描写更为接近，《幽明录》记载：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饥饿殆死。…便共没水，逆流二里，得度山，出一大溪。

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因邀回家。其家……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酒酣作乐……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

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所^[12]。

不难发现，《桃花源记》与《刘晨阮肇》的叙事结构高度相似，具体表现在：一是“误入”的叙事起点：渔人本为捕鱼，刘晨阮肇本为采药，皆是偶然闯入异境，并非主动探寻神秘世界，如此便构建出一个“误打误撞”的叙事触发机制。二是富足与隔绝的空间特征。刘晨阮肇所入之

处，侍婢、美食、财宝、雅集，生活丰裕，精神美满，桃花源亦然，皆与人境殊绝，构建出相似的超脱世俗的理想空间范式。三是时间的文本张力。二者均嵌入了具体的朝代、年号，桃花源历经秦、汉到魏晋，《刘晨阮肇》则从汉明帝永平五年至东晋太元，这种历史纪年的真实感，与离开后难以复返的虚幻结局形成了巨大张力。刘晨阮肇明确指向的“神仙世界”，而桃花源的属性悬置，从而引发人们对其是人间遗世还是“神仙异境”的追问。两则故事借助“误入”“异境”与“时空张力”的叙事结构，形成“现实-超现实”的对话模式，桃花源的留白结局，为其文学阐释提供了多元空间。

4. “后遂无问津者”：“桃花源”理想世界的解构与失落

“问津”典出《论语·微子》中孔子“使子路问津”，既是指具体的道路问询，亦可理解为探寻人生方向、理想境界的隐喻。《桃花源记》中的渔人离开桃花源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而后“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成为关键转介，借由渔人向太守的陈述与行动，将其个人偶然的“形而下”的秘境探寻，延至为外界对桃花源的集体“问津”，实现社会层面对理想范式“形而上”意义追问的叙事升维。无论是太守为代表的官方还是后来刘子骥为代表的高士，探寻皆以失败告终。细绎其原因，这是与外界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桃花源诗》：“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这是淳朴的无政府社会，没有赋税，无需纪历，隐逸自足，不问世事，故“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1-403]“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说明桃花源的隐逸自足、淳朴无争，是建立在对外界封闭的基础之上。桃花源既抗拒着外界的繁杂与纷扰，也在无意间将自身置于一种脆弱的平衡里。从被发现的瞬间，就注定会因现实与秘境的本质冲突，重新隐匿，让后来者的探寻只能以失败收场，深刻凸显出理想世界在现实语境下可遇不可求、可寻不可留的虚幻与无奈，让桃花源故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隐逸传说，更成为映照现实与理想永恒矛盾的哲学载体。

陶渊明一生在仕隐间辗转抉择，而其诗歌创作，也始终紧紧伴随着对政治现实问题的深刻探讨。尤其在晚年晋宋易代的特殊节点，寄慨更为深沉。将其经历与《桃花源记》的故事参照，能清晰洞察他思想中探寻理想社会却终归失败的轨迹。403年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有“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1-181]之句，义熙十三年（417）的晋宋易代前夕，作《饮酒》组诗，感慨“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1-249]。此时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已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所云：“劲气侵襟袖，箠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1-184]越往后期，贫穷、灾荒、饥饿与寒冷越发见诸诗中，54岁所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言：“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1-98]《岁暮和张常侍》亦云：“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1-148]晚年所作《咏贫士七首》之二：“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1-313]饥饿的诗人已经无心读书，甚而至于不得不去乞食，《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1-93]。田园之乐荡然不复存在，一如其《归园田居》其四所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1-80]

入宋以后，陶渊明改名为“潜”，作品无复朝代而改以甲子纪年，诗歌更倾向于隐喻式书写。如其《述酒》借酒之名隐喻篡弑的史实。晚年所作《拟古》组诗，表达兴亡治乱之慨：“种桑长江边，三年当望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1-286]通篇比喻，深有寄托。黄文煊《陶诗析义》卷四曰：“长江边岂种桑之地？为裕所立，而无以防裕，势终受制，初着既误，后祸自来也。字字隐语，然意义甚明。”^[1-288]易代之际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曲折折，从天上写到人间，从游仙转入论史，末首“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1-353]陶澍注曰：“晋自王敦、桓温，以至刘裕，共、鲧相寻，不闻黜退，魁柄既失，篡弑遂成。此先生所为托言荒渺，姑寄物外之心，而终推祸原，以致其隐痛也。”^[1-355]现实政治理想破灭的隐喻书写，与《桃花源记》恰可构成互文文本，宣告“桃花源”理想的彻底失落。

陶渊明之后，南朝政权更迭频繁，受政局动荡、身世浮沉影响，鲍照、谢灵运、谢朓等人于苦闷中寄情山水，借山水书写个人失意，追求山水背后的哲理与精神超脱，鲜少有对桃花源理想的探寻。直到隋唐易代之际的王绩，以其抒写个体隐逸情怀的《野望》与陶渊明形成艺术对话，

但亦并未重拾对理想桃花源的探寻，仍然没有打破“无问津者”的沉寂。

参考文献:

- [1] [晋]陶潜著, 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1.
-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译林出版社, 2020: 199, 202-203.
- [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M].三联书店, 1959: 164.
- [4] 邓和平.中国土家族源流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221.
- [5] 钟书林.《桃花源记》文本生成问题再探[J].文学遗产,2025,(01):55-67.
- [6] [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 1974: 2208.
- [7] [晋]陈寿撰, [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中华书局, 1982: 341.
- [8] 邵盈午.道德经今解[M].东方出版社, 2023: 238.
- [9]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M].中华书局, 1984: 403.
- [10] 陈田夫, 唐红卫、阳海燕校注.南岳总胜集校注[M].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8: 98.
- [11] [梁]萧统编, [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卷 57) [M].中华书局, 2012: 1060.
- [12] [南朝宋]刘义庆撰, 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卷 1.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1.